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苏辙晚年研究——从“颓然”到“淡然”的心态探析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叶浚琪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呈交日期：2013年4月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摘要	II
宣誓	III-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7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4
第二节 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5-7
第二章 独厚晚年之缘由	8-20
第一节 集大成的重要时期	9-14
第二节 杜门中的心态变化	15-20
第三章 晚年前期的苏辙	21-31
第一节 “心似死灰 多事奚为”之颓然	22-26
第二节 “闲居玩草木，农圃即师友”之悠然	27-31
第四章 晚年后期的苏辙	32-45
第一节 “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之坦然	33-38
第二节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之淡然	39-45
结语	46-47
参考书目	48-50

苏辙晚年研究——从“颓然”到“淡然”的心态探析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AAB04014

日期：2013年4月5日

摘要

本文主要为“苏辙晚年研究”，研究范围则将集中探析苏辙在晚年，即是建中靖中元年（1101）至政和二年（1112）时期的心态变化轨迹。苏辙是北宋中后期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一生的仕途，都深受党争的影响。所以，他的个人心态以及思想变化都与这场斗争紧密相连，也因此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来到了晚年时期，随着蔡京的拜相，在朝政上掀起连番针对元祐党人之政治打压。为求在险境中自保，苏辙选择了在颖昌（今河南许昌）杜门不出，过着谢绝交游的卜居生活。由此可见，相较起前期，苏辙在晚年时期的生活方式是最为不同的。而在这种看似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苏辙的心态却没有因此而一成不变，反而，随着时间运转，政治局势更变，而展现了精彩的一面。首先，若要探析苏辙晚年时期的心态变化，必须先将其生平作出明确分期。以苏辙在嘉佑二年（1057）入仕为始，依据其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可将他的生平概括成五个时期。其中，其中，分别是嘉佑入仕期、熙丰贬谪期、元祐高峰期、绍圣颠沛期和崇宁闲居期。而晚年时期指的就是崇宁大观年间，苏辙闲居于颖昌这段长达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里，由于党祸的影响，苏辙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未能得到自由。再加上，他人生中重要知音，哥哥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逝世，当然也为苏辙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所以，在这样不利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命运之下，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也就更具探讨价值。

因此，在本文中，将先把苏辙的生平进行分期，来整理出晚年时期的研究价值。此外，若以苏辙当时的生活情况为基本依据，可更进一步地将他的晚年时期，再分

成前后两期。如此一来，他此时的心态变化也就更加明显了。之后，为了进一步探析苏辙晚年心态，必须先依循作品创作的时间顺序来阅读。再加上政治环境以及个人际遇为辅助，苏辙在当时的心态发展之脉络便清晰可见了。因此，在本文中的最后两章，主要将分别挑选出苏辙在晚年前期和后期的代表作品，来论证苏辙在不同阶段的独特心态。

[关键词] 苏辙晚年 杜门不出 颓然 颖昌

致谢

在这一刻，真想高呼：“我终于完成了！”

从开始收集资料的茫然，到完成初稿的欣然，再转化成大幅度修改初稿的决然，最后，终于换来了这一时刻的悠然。过程虽然不算艰辛，但是心态上也算历经了起伏。对于能够安然地如期完成论文，心中充满感激。

首先，最想要感谢余老师。能够成为老师的学生，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抽签制度下，能够成功抽中自己的第一选择，对我这个从小到大没有抽奖运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大学上了老师三门课，每堂授课都仿佛经历了一次的脑力激荡。所以，不仅于课业，甚至待人处事上，从老师身上都获得了不少启发。在此，要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不吝赐教。

之后，要感谢一直相知相惜的姐姐。要谢谢她拐我踏入这条“不归路”，并且，辛苦地做好了前辈的角色。无论是生活上以及课业上，非常感谢有她的陪伴。此外，当然还有辛苦的妈妈，谢谢你包容了我的任性，忍受我阴晴不定的脾气。最后，谢谢这三年教导过我的老师，陪伴过我的朋友、同学，谢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拼图更加完整精彩。

第一章 绪论

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颖滨遗老，人称“小苏”。苏辙乃苏洵之子，苏轼之弟，眉山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宋徽宗正和二年（1112），享年七十四岁。（苏辙，1990：1）苏辙与其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合称三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父亲的教导熏陶之下，苏辙自幼就博览全书，再加上其沉静好学的个性，便很快地成长为一个见解卓异，学识渊博的青年。年少入仕的苏辙，其大部分仕途都是在党争中度过的。然而，波折不断的政治仕途也间接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在两次贬官和晚年闲居之时，尤致力于著述。其著作除了《栾城集》之外，还包括了《诗集传》、《古史》、《龙川别志》、《老子解》等等，这些学术著作都颇能代表苏辙在文学方面的作为。

然而，自古以来，在宋代文学研究中，苏辙可说是备受冷落的，因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大多数都集中在苏轼一人的身上。然而，这对苏辙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其实他诗文兼胜，作诗两千多首，散文一千多篇，尤以散文见长。由此可见，苏辙的文学成就也是相当高的。此外，北宋中叶是宋代散文发展的巅峰期、鼎盛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杨庆存，2011：152）因此，在现今对于苏辙的研究当中，主要还是着重在他的散文和文论上，对于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不多。而纵观苏辙一生，会发现其历经了不少起伏考验，所以在他的人生中之特定阶段和地点，必然也将展现出独特的文学作品和精神面貌。可是，目前为止将苏辙

的生平际遇与其思想、作品风格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依然不多。由此可见，有关苏辙的阶段性的研究是尚未成熟的。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中，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朋党”问题历代皆有，其中则以宋代最为惨烈。而在党争的影响下，苏辙作为旧党成员，政治生涯时常在贬谪和在朝中徘徊。因此，以党争中的际遇为主要依据，可将苏辙的生平分为五个时期。其中，分别是嘉佑入仕期、熙丰贬谪期、元祐高峰期、绍圣颠沛期和崇宁闲居期。而这五个时期当中，又以晚年时期最为特出。首先，为了逃离党争迫害，苏辙在晚年时卜居颖昌、杜门不出长达十二载。除了生活环境的不同之外，他晚年时期的作品类型也有别于前期地以诗歌为主。所以，在这样的变化差异之下，苏辙晚年时期的心态自然也值得深入探讨。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辙晚年时期的心态发展轨迹。本文将分为三章来进行论述。第二章会先将苏辙的生平进行分期来解析独厚晚年之缘由，并且依据他当时心态的改变，把晚年分成前后两期。之后，在第三和四章，会分别论述苏辙在晚年前期（1101-1106）和晚年后期（1107-1112）的心态特质。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在后人的印象中，苏辙总是和苏轼相提并论的。两者之间无论是交游、思想、政见上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学者们也常常将两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相比之下，苏辙的名气是远远不如苏轼的。而在大学第二年的“唐宋文选”课中，由于研讨课报告撰写的需求，笔者才开始对苏辙有了初步了解。在阅读了苏辙于黄州时期

的相关资料后，会发现苏辙与哥哥苏轼之间相通之处确实不少，而且在其创作中，也可发现他有受到哥哥苏轼影响的痕迹。所以，对于苏氏兄弟之间在患难中的相知相惜，除了羡慕之外，也深受感动。因此，才会选择苏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在进行了资料收集之后，尤其对晚年时期的苏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首先，会想了解在失去了重要的哥哥苏轼之后，独自面对党争祸害的苏辙又将如何自处？再来，在晚年时期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影响下，苏辙的作品类型却有所改变，那么其人是否如其文呢？在心态上有没有任何改变呢？因此，本文才会以苏辙晚年心态变化的脉络为主要研究范畴。

然而，在翻阅了宋代研究资料后，会发现有关苏辙的论述中，果然往往都离不开苏轼。比如，从生平事迹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文学史新编》中就有提及：“无论从政治生涯还是日常生活方面看，苏辙都与乃兄苏轼有着太多、太密切的关联。但与苏轼相比，他又有明显的差距，性格比较脆弱，而才气也稍乏。”（章培恒、骆玉明，1996：247）而在《宋代文学史》中，也有相关论述：“苏辙与乃兄不仅生平出处略同，思想也颇相似”（孙望、常国武，1996：270）此外，也有从作品成就方面来作出对比。在《艺概》中提及：“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刘熙载，1978：29）由此可见，在两者之间比较的结果，往往都是认为苏辙无论是在学术著作或是精神境界上，都略逊一筹。甚至还有苏辙是以苏轼影子的形式得以存在的说法。无可否认，苏辙在作品上与苏轼确实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两人之间的唱和诗，尤为明显。但是，苏氏兄弟两人自幼一起读书，生活际遇相似度也高。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也实属合理。但是，他们兄弟的性格差异甚大，也影响了他们

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曾枣庄、吴洪泽，2010：1181）所以，若将苏辙作为苏轼的附属品来看待，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苏辙生性内敛，思想活跃却沉默寡言，其人格特质自然也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所以，比起与苏轼的对比研究，以其独具之力，卓然特立，自成一家的文学成就，苏辙是值得被独立看待的。（迟文君、宋续连等主编，1999：32）所以，来到晚年时期，苏辙在缺乏苏轼的陪伴之下，独自遭受了党祸冲击。在满腹冤屈无处宣泄的情况之下，苏辙的心态自然会有所不同。这也将会是其独特心境的起点，探讨价值所在。

另外，如同前文所提，苏辙在晚年时期，其作品主要以诗歌为主。这也是其晚年时期的重要特质之一。对于宋人而言，诗不但是抒情或流露情感的场所，同时也把诗当作传达理智的地方。（吉川幸次郎，1977：11）苏辙晚年时期，作诗多达三百七十馀首，是北宋后期诗歌史上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些诗歌作品中，生性内敛沉静的苏辙所寄寓的思想感情，无论是偏向理智或是感性，必定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再说，宋人以“治心养气”为本，讲天长地久的功夫，因而无论是学道或者学诗，晚年都是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阶段。（周裕锴，2007：348）因此，综合以上的特点，无论是外在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内心思想上的冲击，都是造就了苏辙晚年之研究价值的重要因素。而晚年时期也是苏辙无论在思想上或是作品创作上的集大成时期，这也是本文选择以苏辙晚年时期心态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翻看有关宋代文学研究资料综述发现，后人很少将苏辙独立自成一章来进行论述。比如：在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中，苏辙是和苏门弟子合为一章的。而程千帆、吴新雷所撰写的《两宋文学史》中，则是把苏辙归在“散文世家”一节中，此节主要内容是论述三苏文论，并没有深入地为苏辙进行分析研究。虽然有关苏辙的专著研究不多，但是苏辙研究概况整理，却能找到专题论文。近代学者李冬梅（李冬梅，2002：111-114）在〈苏辙研究综述〉中，就将有关苏辙的专门研究作出了系统性的分类。她把苏辙研究基本分为四大类，即是：生平传记、文学理论、学术思想和作品研究。这是进行苏辙研究之前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首先，在有关苏辙生平研究，历来争议不大。苏辙在有生之年所写下的〈颖滨遗老传〉一文中，就将自己的生平事迹以时间顺序排列清楚列明了。再加上，他也将自己所作的诗文作品，按照创作年份结集成册，编成了《栾城集》四集。因此，这些都是研究苏辙生平的重要佐证。由于是出自本人之手，可信度高，所以，后世学者基本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添加或补充，争议性不大。至于年谱类的作品，宋人孙汝所编的〈苏颖滨年表〉，是现存最早的苏辙年谱资料。而今人在此基础上，陆续为之补正、新编，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枣庄《苏辙年谱》、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曾枣庄、舒大刚《北宋文学家年谱》和孔凡礼《苏辙年谱》等等。通过这些年谱资料，可以把历代有关苏辙的资料收集整理，为现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

另外，苏辙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成就历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其中，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就有收入苏辙的作品。今人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就以曾枣庄所著《三苏文艺思想》最有代表性。这部著作里采用了比较系统性的方式来探讨了苏辙的文学理论，对后人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学术思想方面，曾枣庄的〈《苏氏易传》与三苏的道家思想〉、舒大刚〈苏辙“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述评〉以及吴晓萍〈苏辙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等等学术论文，都为苏辙的学术思想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至于作品类，苏辙一生著述甚多。除了九十六卷《栾城》四集之外，其他还有《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二卷、《老子解》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这些都是苏辙学术著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今人所点校的作品则以曾枣庄、马德富点校的《栾城集》以及陈宏天、高秀芳点校的《苏辙集》最为常见。而由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则是目前最为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和出版三苏文献及其研究资料的汇编。以上所述，都是苏辙研究的重要资料。

纵观而言，与苏轼研究相比，目前苏辙的研究成果确实比较逊色。然而，其中有关苏辙阶段性研究的专书更是数量不多。当中，幸运地是苏辙自己将其作品汇编成了集，再加上有可靠年谱的流转，为阶段性研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因此，本文将先以苏辙年谱为主要的参考资料，再加上《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等古籍，整理出苏辙晚年时期的生平事迹以及政治情况。之后，在第二章中以此

为基础，对苏辙的生平作出分期，并且，论述独厚晚年的缘由。之后，再集合当时的作品，并且顺着创作时间来一一解析，来将苏辙晚年时期细分为前后两期，从中探析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所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主要会先选出那段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再配合时代背景、个人际遇来整理出苏辙晚年特定时期里的典型心态以及其变化轨迹。

第二章 独厚晚年之缘由

在政治发展史中，党争不断可说是宋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过程。在宋太祖的提倡下，宋代的治国方案主要偏向于“崇文抑武”。如此一来，造成宋代士大夫的从政格局渐渐扩大，参政心态都普遍积极。苏辙字子由，生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脱脱，1977：10835）自苏辙于嘉佑二年（1057）登进士第起，之后他的仕途几乎大部分时间是与党争相系的。以神宗时期熙丰变法为始，再到元祐党争、绍圣党争、直至崇宁党争，贯穿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时共计四十年。在这几次的党争，苏辙皆参与其中。因此，他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大致上都随着政治势力转移，即是党争结果而改变。

所以，若以苏辙在不同党争中的际遇为主要基本依据，可将他的生平概括为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分别是嘉佑时期的入仕初期、熙丰年间的贬谪期、元祐时期的高峰期、绍圣年间的颠沛期以及崇宁大观年间的闲居时期。然而，在这五个时期中，又以晚年时期最具探讨价值。因为来到晚年之时，苏辙在历经了一段颠沛的贬谪生涯后，选择了在颖昌过杜门不出的日子。于是，对他而言，在这与前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当中，究竟他会抱持着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此外，在这个长达十二年的卜居生活中，苏辙的心态究竟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改变？因此，本章节将会先论述选择苏辙的晚年时期为主要研究范围的原因，并且以晚年中苏辙的生活情况为基本依据，来将其晚年时期进行分期。

第一节 集大成的重要时期

若以苏辙人生际遇为主要依据，可将他的生平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其幼年在家学习时期至嘉佑入仕为止。庆历七年（1047），在父亲苏洵奔父丧回家后，苏辙与哥哥就跟着父亲读书了。苏洵当时因为屡次应试失败，所以下定决心努力研究学术。在父亲专心的教导之下，苏辙两兄弟的学术起点可说都是相当高的。因此，在嘉佑二年（1057），苏辙第一次应试就中第了。然而，这次的进士及第后，苏辙没有马上踏入政坛，先是因为母亲的过世返蜀守丧，再来因为制试中的争议答卷，苏辙在仕途初期一直未受重用。直至就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哥哥苏轼居父丧期满，举家返京，这时，苏辙才迎来了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次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在熙宁变法中，苏辙虽然没有关键的影响，然而，他因政见不合而自求外任之举，令他成为了反变法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之后，在元丰二年（1079）时，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连章弹劾，以苏轼诗多讥新法为名，逮其入狱，是为“乌台诗案”。苏辙既是苏轼的亲生弟弟，又是反新法派，即旧党中的重要骨干，当然也脱不了关系。他在苏轼下狱后，主动站出来为其上书陈情。因此，在这次的“乌台诗案”中，相较起其他同受牵连之人，苏辙被处以了较重的贬官之罪，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这次的贬谪是苏辙的宦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对苏辙来说打击甚大。元丰三年（1080）七月，苏辙到筠州赴任。从这时开始直至元丰八年（1085），长达六年的时间，苏辙都被这项琐碎的差

事缠身，因而远离了政治中心。它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过程中以“文字”交相报复的序幕，是新党为扫清言路而对旧党一次的大规模打击。因此，这也可说是苏辙人生历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挫折期。然而，这段难得脱离党争的日子却随着高太后的参政，苏辙的命运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来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突然病逝，当时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脱脱，1977：313）苏辙于元祐元年（1086）抵达京师，担任负责规谏朝政得失的右司谏一职。在高太后的特旨除授下，苏辙从被贬谪边境的小官一举跃升为朝政中的关键人物。上任后，苏辙也不负所托，在弹劾新党人员时发挥了先锋作用。据《栾城集》卷三十六至四十所录，在任职期间，苏辙所上了论时事状多达七十四篇。其中，包含了不少对于当时朝政里的人事建议。由于仕途上的得志，并且得以一展抱负，苏辙在其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迎来了高峰期。

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只维持到元祐八年（1093）。因为随着高太后逝世，哲宗开始主政，苏辙的际遇也开始有了转变。次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这个年号的使用同时也宣告了政局的改变。因为，从年号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主政者的意向。

“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帝从之，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于是天下晓然知帝意向矣。”（陈邦瞻，1977：448）

因此，哲宗亲政之际，就立刻重新起用了新党，同时对旧党进行了驱逐。这项政策上的改变为当时新旧党的局势再一次带来了颠覆。苏辙身为旧党大臣，必然也受到了波及。自此，也就开始了其宦生涯中最颠簸不断的一章。

在这个新党重新得势之际，苏辙当然首当其冲，遭受新党的全面打击。对于苏辙出知汝州，他们认为惩罚过轻。故此，左正言上官均连番弹劾猛攻苏辙，称其“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擅权欺君。”（黄以周等，2004：137）因此，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辙才到了汝州两个月后就再贬袁州，次月再谪筠州，面对了“岁更三黜”的困境。然而，来到了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次加重对于元祐党人的处罚，苏辙远贬雷州。这个时候的苏辙离政治中心可说是越来越远了。只是，新党大臣对于苏辙的迫害并不止于此。元符元年（1098），因董必奏知雷州张逢礼遇苏辙，六月诏苏辙移居循州。（曾枣庄、舒大刚，1999：79）这几年间的长度跋涉、连番奔波，对于当时已年届六旬的苏辙来说，不论身体或精神上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段时期是苏辙的人生中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颠沛波折的一章。

直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辙才迎来北归之日。同年十一月，他被命提举凤翔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就这样，苏辙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开始了其闲居颖昌的生活。在那段谪居的日子里，元祐大臣早已凋零，仅馀下苟延残喘之势。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开始表现出畏祸及身的态度，对于政治世态已经不像以前般关心了。在被命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

之时，他于《复官官观谢表》云：“臣已望阙祇受论者。谪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苏辙，1990：1081）由此，可见苏辙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以及充满重获新生的感慨。然而，回首前生，其“禀生甚微，处世多难。反身自省，本欲忠孝于君亲；报国何功，粗免愧畏于俯仰。徒以冰炭难于同器，仇怨因而满前。被以恶名，指为私党。将杜其生还之路，遂立为不赦之文。前后三迁，奔驰万里。瘴疠缠扰，骨肉丧亡。闻者为臣伤心，见者为臣陨涕。虽百夫所聚，公议自明。而众楚相咻，有口谁诉。”所以，他决定“顷尝卜居嵩颖之间，粗有伏腊之备。杜门可以卒岁，蔬食可以终身。生当击壤以咏圣功，死当结草以效诚节。”，就这样，苏辙开始了其闲居颖昌的生活。以此来看，在当时激烈的党争影响下，他甚至产生了想逃离这恶劣环境的想法。所以，在晚年时期的苏辙无论是生活环境，或是心态上都是跟前期有所不同的。因此，这样明显的转变也就是其研究价值之一。

在苏辙的晚年时期，首先在政治环境上看到的是新党对于旧党成员的步步逼近。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徽宗的执政之下，新党人员复权，党争再起。翌年，徽宗改元崇宁，以绍述熙宁新政为志。（林瑞翰，1989：279）之后，随着蔡京拜相，更是解开了崇宁党禁的序幕。崇宁元年（1102）五月，朝廷接受了臣僚主要针对元祐党人而发的奏文，重新核实其罪。对此，朝廷下诏：苏轼等已去世之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曾枣庄、舒大刚，1999：3119）由此可见，在徽宗之政下，苏辙等旧党成员愈加失去了其在朝政中的影响。所以，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身为旧党重臣的苏辙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来自处自适，确实值得去延伸探讨。

不但如此，当时的政治压迫甚至还蔓延到了学术范围。蔡京在崇宁元年（1102）七月拜相，是月禁元祐诸法，并设立“讲议司”，这个用来“讲议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为而未暇者”（陈邦瞻，1977：87）的机构。九月，更怂恿徽宗下诏，设立元祐党人碑，规定入籍者不得与在京差遣。（黄以周等，2004：3764）由于当时的元祐党人大多年老，或着已逝世，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实际意义，朝廷相继颁布了相关诏令，进一步加强对元祐党人的禁锢。其中，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丁丑，诏：“邪说讹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
请勿施用。”

崇宁二年（1103）三月乙酉，诏党人子弟毋至阙下。

四月乙亥，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陈邦瞻，1977：
483-484）

如此一来，元祐党人之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都被禁毁了。从朝廷的这些措施来看，无非是想彻底否定所谓“逆党”的一切思想学问和政事，避免其继续影响人心。（涂美云，2012：342）再来，禁止党人之子弟到阙下，也得以令旧党势力难以复起。在新党所实施的步步禁锢下，足以显示出他们对于元祐党人之威胁性的戒惧。然而，这样的学术禁锢也可说是对于文人的创作心血和思想精华的销毁。所以，面对文学创作上的种种限制，苏辙若要以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势必更加困难。正因如此，苏辙在晚年时期的作品才更显得可贵，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也势必更具有其丰富精彩的一面。

此外，苏辙的一生因为党争而有所起伏，这样的生活上的波折自然也造就了其丰富人生阅历。然而，在苏辙的生平考察中，可发现他虽然身处逆境中，但是心态上总是能很好地调适过来。所以，若将苏辙的每一次贬谪打击，视作其思想发展的成长。那么，来到了晚年时期，从崇宁元年直到去世为止，可说其思想最后成熟的阶段。所以，此时的苏辙在这个人生即将迈向终点的时刻，他对于自我人生感悟上的思考也会达到一个更深刻的境界。而且，在这段晚年杜门不出的日子，苏辙几乎杜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专注致力于复理旧著。因此，在颖昌时期他的学术著作也得到了系统性的总结。由此可见，晚年时期不仅仅是苏辙思想上再进阶的时期，更是其学术著述的集大成时期。如此一来，相较起苏辙生平其他阶段，晚年时期的研究价值则更为明显了。

纵观以上所言，以苏辙生平事迹，尤其是党争为主要依据，可将其生平概括成五个阶段。其中，又以晚年时期最为重要。因为，在进入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政和二年（1112）这段晚年时期之前，苏辙先经历了其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段贬谪岁月。因此，可以了解到此时的苏辙在生活环境以及心态上与前期相比，是有所不同的。此外，在不利的政治社会之下，苏辙身为旧党仅剩的人员之一，他采取了自己独特的态度去应付当下的困境。这样心态上的变化以及其如何在逆境中自处的精神都是极为值得去延伸探讨的。还有，晚年时期是其思想上最为成熟的阶段，这时不但是苏辙学术著述上的总合时期，亦是其人生经验的总结阶段。所以，若要进行苏辙研究，其晚年时期将是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章。其中，又以苏辙晚年时期所展现的心态最为关键。

第二节 杜门中的心态变化

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起，苏辙在任便居住之下，选择了颖昌作为闲居之地。所以，在崇宁元年（1102）至政和二年（1112），长达将近十二年的岁月中，他都在此卜居生活。通过苏辙此时的作品，可发现其闲居期间，主要都是杜门不出的。然而，在这样逃避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下，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反而是有所发展的。在通过当时的作品，再加上徽宗持政年间的政治环境以及苏辙的个人际遇来更进一步解析，就可以大致地把苏辙的晚年时期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苏辙所显露出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时期分别是建中靖国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1106），这六年是为前期，而大观元年（1107）至政和二年（1112），后六年则为后期。

首先，要更准确地将苏辙晚年时期做出分期，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手。从建中靖国元年（1101）开始，随着徽宗对新党成员的明显重用，旧党成员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特别是在蔡京拜相之后，对于元祐党人的政治迫害是一波波接踵而来的。首先，第一步是对于旧党成员的连番追贬，这也就是崇宁党禁的开始。在建中靖国时期，所谓“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黄以周等，2004：639）由此可见，当时蔡氏兄弟以及苏氏兄弟可说是各为新旧党的主干。因此，当蔡京得以重诏回京之时，当然也使旧党的局势趋向不利，苏氏兄弟必然首当其中。此时的苏辙似乎早已看清局势，开始了其在颖昌的生活。

然而，这段日子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顺遂。来到崇宁年间，新党阵营为了避免政权上的反复、杜绝后患，采取了三立党人碑的做法来加深对于旧党人员的打压。第一次的立碑就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乙亥，御批付中书省：应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订姓名人数进入，诏苏辙等令三省籍记姓名，不得与在京差遣。（黄以周等，2004：682-683）此外，这些“奸党”的罪状还必须刻石于端礼门，公告天下。这项措施的颁布为的就是确立元祐党人“不忠之臣”的罪状，进而断绝他们参与政事的机会。由此可见，苏辙虽然早已闭门于颖昌，但是依然离不开政治斗争的影响。这样的政局上的变化也对苏辙的心态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出于畏人畏事的心理，此时的苏辙甚至选择了独自迁居汝南避难。这时也可说是苏辙人生中心态最为悲观的时期。

而第二次的立碑，就是在崇宁二年（1103）九月，新党成员认为“奸党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遂请朝廷下诏“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黄以周等，2004：733-734）在此来看，新党并不满足于单单确立元祐党人的罪状，而是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元祐党人碑所能够影响的范围。此外，如同前文所述，同年，朝廷的禁锢范围还延伸到了学术层面，四月，焚毁了三苏父子、黄庭坚以及秦观等人的文集。所以，此时由蔡京为首所策划的政治迫害正在逐步升级，不但要元祐党人失去对于当下朝政的影响力，还希望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得流传出去。若以此恶劣政治环境为据，不难理解苏辙独迁汝南之心态偏向颓然消极的原因。

时间过了不足一年，崇宁三年(1104)六月，朝廷又下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应系籍奸党已责降人，并各依旧，除今来入籍人数外，余并出籍。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黄以周等，2004：810）此次的党碑不仅人数增加了三百余人，而且还必须放置在文德殿门东壁，永为时代子孙所戒的。因此，这次党争的祸害不止被定罪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还牵连了党员们的子孙。对于党争之事，宋代学者王明清（王明清，2001：3897）在《玉照新志》中曾评道：“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疾，悲夫！”由此可见，在当时各党之间对付政敌的手段可说是愈加激烈的，元祐党人碑的设立表现出当时执政的新党成员对于政敌的驱逐。面对了政治打击和学术之祸，此时的苏辙的心态自然也就以悲观郁闷为主了。

在两年后，苏辙的生活情况迎来了重要的转机。主要是因为设立了数年的元祐党人碑，在崇宁五年（1106）正月乙巳，由于天象异变而被下旨除毁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

“诏：以星文变见，避正殿，损常膳，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廷阙失。”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刻石，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劾，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黄以周等，2004：868）

在此来看，徽宗因为畏惧于天象的变化而下诏毁了石碑。然而，石碑的摧毁同时也象征着新党对于旧党成员的报复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了。此时，苏辙（1990：925）作

诗感慨到：“蒙蒙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从这短短两句诗可见，其情感真切、得雨之乐满溢。这种对于雨过天晴，万物重新萌芽之景的描写仿佛也侧面反映出苏辙当时的心情。在政治情况的缓和之下，他紧绷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得以暂时放松了，并且不再执着于党争时期所遭受的打击。

所以，在有所好转的政治背景为前提之下，来到大观元年时期，即是苏辙的晚年后期，他的心态自然也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大观二年（1108）正月，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苏辙复朝议大夫，迁中大夫，皆有谢表并焚黄文。（孔凡礼，2001：631）徽宗这次颁诏大赦天下，基本上算是恢复了苏辙迁居汝南之前的俸禄。虽然生活物质上依然贫乏，但是相比前期算是有改善了。之后，在同一年六月，朝廷诏特授苏辙朝散大夫。（曾枣庄、舒大刚，2004：3119）虽然得到了这个散官职位，但是苏辙对仕途却不再眷恋了。因为，一来其年纪也大了，再说他也看清了当下的局势。对此，苏辙（1987：1473）提到：

“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年，有田颖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愧。”

在此来看，苏辙说明了自己生活环境一直都是比较清寒的。表明上是描述了苏辙好不容易才得以在颖昌有自己的田地，却因为耕作能力的不足，未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惭愧之意。然而，这里其实也承载着苏辙不妄求，希望可以自食其力的想法。这首诗写于大观二年（1108）复官之后，以此来推论，可看出大赦后的苏辙是无心重返

朝廷的，依然保持着杜门不出的卜居生活。而且，其大部分的心思可说是都投注在主宰自身与家人温饱的田园生活之中了。

然而，无心当官，重返朝廷，并不等于对政治民生漠然。首先，闲居中的苏辙，时常将自己归耕的日常生活融入了文学作品当中。其中作品大多以诗作为主。他晚年闲居颖昌，身杂农牧，目睹田家艰辛，写过一些同情人民的作品，感情都是沉挚痛切的。（吕慧娟、刘波、卢达，1997：96）因此，在大观年间，苏辙所写的〈买炭〉和〈八玺〉都是晚年时期少见的政治诗。由此可见，在政治环境的允许之下，他虽然杜门不出，但是还是不失初心，敢于论政。以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心态应该是坦然磊落的，才会不畏言及心中的民生忧患。

此外，在晚年时期的苏辙，随着生活重心的转换，日子与心态都可说是逐渐趋向闲适。所以，作品中也自然流露出平静的意味。此时的苏辙不但表现出了自适的心态，也常常以作为老农而乐。在大观四年（1110），春节时分，春意盎然，苏辙与外孙文九乐新春时，作了不少诗。其中，在〈新春五绝·其五〉里就提到：

“雪覆西山三顷麦，一犁春雨祝天工。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苏辙，1987：1487）

前两句透露出当时的天公作美，春雪、春雨下得及时，这些都是对于麦收有利的。后二句则称自己老农，并且感到庆幸得以参与收成的喜悦。在此看来，苏辙以老农自比，将田园之乐为己之乐。一个昔日纵横官场的人，如今却可以放下身段，以老

农自豪，这绝对是非一般文人学士所能办到的。在田园生活的熏陶下，此时的苏辙在心态上似乎已经自我调适，逐渐逃离失意官场、饱受政治迫害的苦闷了。因此，再加上苏辙的淡泊本性的驱使，他晚年后期末段的心态也返朴归真，回归淡然了。

总的来说，苏辙的作品并非件件都可见党争的影响，但是党争确实在他的作品里烙下了深刻又清晰的痕迹。（李佩如，2005：131）所以，依据当时政治局势的更动，苏辙的晚年时期可被分为前后两期。一开始，由于党争祸害不断，所以对于苏辙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因此，在晚年前期，即是崇宁年间，他的心态是偏向颓然悲观的。之后，随着政治情况的好转，苏辙的待遇变好，他在晚年后期的主要心态已经转变成淡然自适了。由此可见，可以清楚发现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是一个转变过程的。因此，通过前后期的区分，可以更好地归纳出此时苏辙的心路历程。

第三章 晚年前期的苏辙

在蔡京等新党对朝政的把持下，元祐党人纷纷都遭受了激烈的打压。然而，他们对于旧党成员的报复举动，不止于政治上的打压，还包含了文字方面的迫害。然而，身为元祐党人之精神人物之一，苏辙自然劫数难逃。在经历了一段颠沛生涯后，他最终选择了寓居颖昌来度过晚年时光。这样闭门度过余生的方式，正是其避祸的方法。据《宋史》所载：其“筑室于许，号颖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脱脱，1977：10835）在这短短数十字中，就足以道出了苏辙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从建中靖国元年（1102）至政和二年（1112），苏辙都是在闭门中度过的。然而，虽然此时在生活形式上比较单调，但是因为政治环境的缘故，他在晚年前期以及后期的心态其实是有所转变的。因此，若要还原其当时的精神面貌，势必得先随着时间的顺序，向其作品入手。因为，通过当时的作品解析，再加上徽宗持政年间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际遇，苏辙的心态之发展脉络便清晰可见。

此外，对于苏辙晚年时期卜居避祸的做法，学者也给予了自己的评价。如：近代学者萧庆伟在《北宋新旧文学与党争》中，就提到了“颓然自废”乃是苏辙晚年时期的主要心态。对此，他提出了负面的评价，认为苏辙因为无法正视内心对于政事关心与否的矛盾挣扎，进而落入颓然消极的心态，晚年时期基本上都过着自我颓废的生活。但是，在经过苏辙的作品分析后，发现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全面。究竟苏辙这份颓然心态是否完全占据了其晚年时期的所有日子？还是随着时势的转变，

心态自然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章将分为两个小节，以苏辙在晚年前期，即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崇宁五年（1106）所创作的作品为主要依据，来探究苏辙这段期间的主要心态写照。

第一节 “心似死灰 多事奚为”之颓然

如同前文所述，在崇宁年间，由于新党得志，旧党成员的处境可说是相当险峻的。因为在当时，他们都不断地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贬谪。再加上蔡京把持朝政的操弄下，旧党成员不是远走避祸，就是早已亡佚。来到崇宁年间，元祐党人在此时可说是已经仅剩无几。然而，随着年岁渐长的同时，苏辙也失去了其交游唱酬的对象，特别是哥哥苏轼。一直以来，两兄弟在仕途上都是彼此最大的依靠。无论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潮，兄弟两人透过唱和诗互相安慰、开解。“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正是兄弟两人深厚情谊的最佳写照。在建国靖中元年（1101）苏轼的逝世，无疑对于苏辙来说是一项更重大的打击。因为，哥哥是苏辙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所以，在失去了互相安慰、扶持的对象后，也令苏辙在晚年时期的消极心情无处宣泄，造就了他愈加内敛的个性。因此，步入迟暮之年的苏辙，在遭受了连番打击后，更是愈加身心疲惫，也开始出现了畏人畏事的逃避心态。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来到崇宁二年（1103），苏辙甚至独自迁居汝南来避祸。据《苏辙年谱》所载：“崇宁二年（1103），姜唐佐自琼州来，正月，补兄轼赠句赠唐佐，时迁汝南独居。”（孔凡礼，2001：603）其中，在苏辙（1990：

909) 所赠于唐佐诗中就有提到：“崇宁二月正月，随计过汝南，以此句相示”由此可见，在崇宁二年正月。苏辙就独自一人到汝南去住了。之后，他也作有〈迁居汝南〉一诗。其中，提及“亟逃颍州籍，来贯汝南户。妻孥不及将，童仆具樽俎。身如孤栖鹊，夜起三绕树。”（苏辙，1990：909）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恐慌令苏辙不得迁移避祸。他无暇顾及妻女，更无随从侍奉在侧，其独迁汝南之狼狈足以显现出当时其境遇之窘迫。此时的苏辙就好像独自栖息的雀鸟般，心情漂泊、悲苦不已。由此可见，他在汝南时的心情可说是异常沉重的。

所以，通过苏辙的诗作解析，可以发现在晚年早期的一开始，他展现了少见的消极悲观心态。其中，苏辙在作品中提及了自己的“颓然”心情。“颓然”一词主要可见于苏辙在崇宁二年（1103）迁居于汝南时，所作的两首诗。第一首诗为〈癸未生日〉，苏辙（1990：911）写道：

“我生本无生，安有六十五。生来逐世法，妄谓得此数。随流登中朝，失脚堕南土。人言我当喜，亦言我当惧。我心终颓然，喜惧不入故。归来二顷田，且复种禾黍。或疑颍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为，均是食粟处。儿言生日至，可就瞿昙语。平生不为恶，今日安所诉。老聃西入胡，孔子东归鲁。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预。”

由此来看，苏辙对于自己当时的遭遇感到相当无奈。因此，在六十五岁生日的这天，苏辙感慨到自己因为不是朝中的主流势力，才会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此时独自避祸于汝南中的苏辙，在心态上自然也是倍感无助的。所以，他写道“人言我当喜，亦言我当惧”，可见苏辙当时对于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是非常敏感，甚至是感到畏

惧的。苏辙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我心终颓然，喜惧不入故”。以此来看，苏辙认为自己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主要源头是来自于他人的言论。正因为新党成员不断向朝廷进言，才会引发了崇宁党争。由于对党争祸害的顾虑，苏辙才会在汝南过着孤苦的日子。因此，在这样的负面情绪笼罩下，苏辙心态也愈加悲观颓然了。

之后，由于政治环境一直未见好转，苏辙为了自保，独自在汝南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重阳节，苏辙（1990：916）在〈九日三首〉中写道：

早岁寡欢意，衰年仍病缠。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钱。萸菊惊秋晚，儿孙慰目前。
登高懒不出，多酌任颓然。狂夫老无赖，见逐便忘归。小酌还成醉，侨居不觉非。
妻孥应念我，风雨未缝衣。忧患十年足，何时赋式微。黄菊与秋竞，白须随日添。
时人知不惠，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尽，犹存薄俸沾。日西闻客至，更问酒家帘。

在此来看，苏辙的心情依然没有从党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认为自己早年时期，鲜少欢乐顺意的事情，甚至来到了晚年也还得与病痛继续纠缠。这里的病并不单纯指身上的病痛，也指其心里的不舒畅。此时，苏辙的颓然消极心情似乎更加深刻了。适逢重阳佳节，他在小酌后，情绪却没有放松。反而，发出了“登高懒不出，多酌任颓然”的感慨。借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意志消极，无论是行动上或是心态上，都以颓废慵懒为主。因为，由于党争的影响，算上之前颠沛流离的贬谪日子，在寓居之前，苏辙已经过了将近十年身处忧患的日子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却还看不到尽头。由此可见，苏辙当时的生活素质也是比较贫乏的。因为在多番贬谪之后，苏

辙所能得的自然只剩下薄俸。政途失意之时，苏辙还得为现实生活需求伤神。所以，在多方的负面因素的影响之下，此时可说是苏辙人生中最悲苦的时期。他当时不但心态消极，甚至达到了“心似死灰”（苏辙，1990：915）的程度。

然而，对于苏辙这一类有别于前期，不时表露出悲观颓然心态的诗作，两位近代研究北宋党争与文人关系的学者在解读后，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偏向负面的评价。他们将在北宋党争的影响下的文人群体心态做出分类，以苏轼、苏辙以及秦观为主要对象来进行论述。其中，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就将当时深受党争影响的士人心态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别。其一是、自我镇定的人生哲学，以苏轼为代表；其二则是、悲苦不振的人生哀叹。以苏辙和秦观为代表。他提到：

“苏辙是元祐党魁之一，绍圣元年，贬知汝州，旋谪筠州，继贬雷州，再谪循州，凡七年，此为贬谪时期；遇赦内徙，寓居颖昌，直至去世，凡十三年，此为闲居时期。其悲苦不振，哀叹人生，主要是在这二十年间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不过，与秦观相比，苏辙的悲苦不振是以“颓然自放”，委顿自弃为特征的。”（沈松勤，1998：358）

由此可见，沈松勤认为虽然同是悲苦为主，但是与秦观相比，苏辙却是多了一份颓然自放。在他看来，苏辙晚年时期过分沉迷佛老之学，因而导致其常常保持“心终颓然”、“心似死灰”。这些都是失去了现实生活的信心而委顿自弃的表现，与苏轼在党锢中历经劫难，越热恋人生的回机向上，判若两域。（沈松勤，1998：358-

364) 同样地，另一位学者萧庆伟在其所著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中，也给予了相似的评价。他指出：

“颓然自废这种心态以苏辙最有代表性。它介于秦观的悲苦和苏轼的超然之间。秦观、苏轼、苏辙同遇放逐，亦皆以佛道自遣，……苏辙则无论是迁谪还是闲居，始终沉迷佛老之境，虽亦得“闲放”之旨，然旷达不及乃兄苏轼，而颓废则远远过之。”（萧庆伟，2001：162）

在此看来，萧庆伟对于晚年时期的苏辙所作出的结论，与沈松勤相似。他认为苏辙晚年时期耽于佛老之境，不能自拔，故其超然之中却又透露出一种低沉颓废的格调。（萧庆伟，2001：163-167）晚年时期更是趋向极端化，而苏辙的人格不具魅力，即与此有关。

其实，无论是“颓然自废”还是“委顿自弃”，在此都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于苏辙晚年时期的人生态度都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他自暴自弃，放任自己深陷于消极的情绪当中。因此，才会陷入“悲苦不振的人生哀叹”。但是，这样的评价对于苏辙来说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两位学者同样地都是以苏辙和苏轼的对比为前提，以苏辙之颓然和苏轼之超然作为结论。进而再以两者之间境界高低之分，来推论出晚年时期苏辙的精神面貌远远不如苏轼。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从苏辙在崇宁二年（1103）时所作的那三首诗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主要心态确实是以“颓然”为主。特别是在独自迁居汝南后，他的消极情绪尤其明显。苏辙在这段时间里，显然是深受党争迫害所困，无论是行动上或精神上都无法获得自由。

第二节 “闲居玩草木，农圃即师友”之悠然

虽然在苏辙于崇宁二年（1103）的作品中，看到了他悲苦不堪的颓然心态。但是，苏辙是否就如近代两位学者所说，在晚年时期里一直都深陷于消极的人生哀叹中呢？在经过苏辙作品的整理，可发现他的心态发展其实是有所改变的。虽然日子依旧孤寂，但是在平静生活的熏陶下，苏辙的情绪随着时间的过去，也愈加平静了。一开始，苏辙迁居汝南为的就是避祸，无奈党锢迫害却还是持续不断。所以，他认为不管身在何方，当时政治所带来的威胁都是会存在的。因此，苏辙心念一转，决定再次闭门于颖昌。

于是，在崇宁三年（1104）正月，苏辙离开汝南重返颖昌。当时，他藉由〈还颖川〉一诗感慨道：

“昔贤仕不遇，避世游金马。嗟我独何为，不容在田野。歌区寄汝南，落泊反长社。东西俱畏人，何适可安者。故庐已荆榛，遗垅但松楸。颓龄迫衰暮，旧物一已舍。安能为妻孥，辛苦问田舍。平生事瞿昙，心外知皆假。归休得溟渤，坐受百川泻。何人实造物，未听相陶冶。”（苏辙，1990：919）

借此，可看出苏辙认为自己在经历如此颠沛落魄的仕途后，不但于政场失去了立足之地，竟然连退隐山野亦无其容身之处。所以，他认为既然早已无处容身，那么无论是居住在汝南，或者颖昌，都没有任何差别的。再加上两地之间的生活环境，也是相当类似，都是落魄艰苦的。所以，既然“东西俱畏人”，那么“何适可安者”。

苏辙也就想通了以当时政治局势之险恶来说，其实无论他居住在何处，也不能担保其安全。既然如此，独居汝南以避祸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且，苏辙的年纪也渐渐老迈，剩下的日子里倒不如与妻儿共度，投身田园来照顾他们的温饱。此诗中也颇有一番对于人生无常，理应追求自适自得的感悟。所以，最后苏辙决定重返颖昌，继续过着杜门不出的生活。而这次的闭门，也就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岁月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崇宁党争的形势逐渐变得更明朗了。在崇宁五年（1106），由于星象的变化，徽宗下令摧毁元祐党人碑。虽然党人碑的销毁并不等同于完全消除苏辙的罪名。但是，对他而言，至少也缓和了新党的连续迫害行动。因此，随着党祸的危害降低，苏辙的心情似乎也慢慢地从颓然消极转变成了安然自适。是年，他写了〈闲居五咏〉（苏辙，1990：933），此诗内容主要分咏杜门、坐忘、读书、买宅、移竹五事，概括了他当时的闲居生活的实况。诗中写道：

可怜杜门久，不觉杜门非。床锐日日销，髀肉年年肥。眼暗书罢读，肺病酒亦稀。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视听了不昧，色声久已微。终然浑为一，莫言我无归。少年常病肺，纳息肺自敛。灵液洗昏烦，百药无此验。尔来观坐忘，一语顿非渐。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诸暗，跏趺百无营，纯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说岂吾僭。习气不易除，书魔闲即至。图史纷满前，展卷辄忘睡。古今浩无垠，得失同一轨。前人已不悟，今人复如此。愍然嫠妇忧，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陈，恸哭伤人气。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一费岂不病，百口僥获安。田家伐榆枣，赋役输缗钱。长大可双栋，琐细堪尺椽。生理付儿曹，老幸食且眠。前年买南园，本为一亩竹。稍去千百竿，欲广西南屋。本心初不尔，百口居未足。龟勉斤斧余，惭愧琅玕绿。东园有余地，补种何年复。凛凛岁寒姿，余木非此族。

由此可见，首先在〈杜门〉中可以看出苏辙当时的生活处境，可说是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有别于早期的身处官场时期的忙碌，“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就是他此时的现实写照。如此看来，苏辙由于仕途上的不遇，不仅自己消极逃避，甚至终年不与外界往来，不再关注社会上的政治动态。这样的自我封闭，自然也让苏辙晚年生活添上了更多的孤寂悲苦。然而，虽然日子困苦，但是他在心态上还是进行自我调适。政治上的更动，看多听久，也就适应了。在减少交游后，他亦看透了世态，外界的纷扰对他而言，就如云淡风轻地过眼云烟而已。诗中不但反映出了他当时的生活环境，还说明他心态上的自适。

之后，借由〈坐忘〉，苏辙讲述了学道的方法。坐忘一词出自《庄子》。在〈大宗师〉篇里提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说明忘却了自己外在的躯壳，摆脱了形体上的束缚，达到了与道相通的境界，这样就叫做坐忘。（曹础基，2000：107）坐忘不仅仅是一种静坐的姿态，更是一种欲达至心境恬然、平静无为境界的修行。苏辙指出在修行后，就能感受“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诸暗”的力量，说明了他认为在领悟了道家学说之玄妙后，就能破除心中一切的不快。而“至人不妄言，此说岂吾僭”二句中所提及的“至人”，是庄子逍遥游中提到的崇高人格之典范。然而，回到本质上，道家所强调的是人必须顺应自然，适其本性，才能超越、解脱“小我”。这样才能达至“无我”的最高境界。而在这当中，又必须先经由“忘我”的过程。“坐忘”正是这个过程中必须的修行功夫。所以，人必须先学着放下执着，才能摆脱心灵上的束缚。在此来看，不仅可发现苏辙对于修行功夫的了解，还看出他当时在道家学说的陶冶下，人生境界也得到了升华。

除了坐忘之外，苏辙修身养性的方法还包括了读书。然而，在读书之余，苏辙也从中得出了不少感悟。在〈读书〉，他先是说明了读书是必须依靠累积才会有成效的。因此，这项习惯是万万不能除的。在读过前人的著作后，苏辙认为古今之变虽然看似无常，但是其实当中的盛衰成败还是依循着一定规律的。所以，对于人生中的得失，也不须太过在意，这只不过是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环而已，无须“恸哭伤人气。”要知道，作家诗文创作中的集大成有赖于学问，而当时人们所说的学问要落实在读书穷理和心性修养两个方面。（张毅，1995：107）由此可见，此时的苏辙虽然身处于孤苦的卜居日子里，但是通过坐忘和读书来修养身心，心态上自然也不见前期的颓然，反而趋向回归平静，闲适自得。

此外，在苏辙的闲居生活中，还可看见他生活重心的转移。一开始因为要避免党争的祸害，苏辙在卜居后就谢绝了自己和外界的交流。因此，他此时的生活目标自然就以治理家园为主。所以，在〈买宅〉这首诗里，苏辙主要描述了自己买房子的过程。从中，可看出苏辙之所以要买宅主要原因是为了安定家中百口的生活。从这个举动，亦可了解到苏辙决定举家定居于颖昌的决心。对于当时的生活环境，苏辙是感到满意的。他非常庆幸自己可以“生理付儿曹，老幸食且眠。”由此可见，来到崇宁五年（1106），政治情况的缓和，让苏辙的心态随之稳定安逸下来。

而〈移竹〉一诗，则是苏辙寄情花木的缩影。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蕴含了苏辙的真实性情。诗中的内容主要是记述了有关移竹过程的生活琐事。然而，

当中的“凛凛岁寒姿，余木非此族”二句，却是借由对于竹岁寒之姿的钟爱，来寄托自己的不屈精神。这里，苏辙所带出的心情是正面潇洒的。他曾说道：“养竹如养人”（苏辙，1990，页926），所以竹子的清高淡泊特性就好像他人生中所追求，并且希望达成的目标。在此，苏辙借由花木立论之举也颇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韵味。

以这六首诗来看，晚年前期的后半段日子里，苏辙的心态可以说是从颓然转换成了安然。诗歌与文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个性人格是紧密地融为一体的。（王水照，1997：68）首先，在〈还颍川〉一诗中，可明显看到苏辙对于世态变化的了然。因此，他决定回归颍昌与家人同住。而这份看透世事的通明心思，也自然地让苏辙的心态上趋向平静。而从〈闲居五咏〉中，则了解到苏辙运用了日常生活的内容作为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之余，他的创作与生活都一起归于平静了。在这段平静自适的岁月中，自然可以看出苏辙的恬然心态。若顺着创作时间来阅读苏辙的作品，可以发现在崇宁年间，他的心态是有所发展的。从一开始，因为元祐党人碑的建立和崇宁学禁等等政治上的迫害，苏辙在晚年前期的心态是以颓然消极为主的。特别是在崇宁二年（1103）独迁汝南之时，那时可说是苏辙人生中情绪上最低潮的时光。然而，在汝南独自居住了一年后，发现苏辙在心境上有所成长了。因此，从崇宁五年（1106）的作品来看，可得知由于政治局势的明朗，再加上自身生活重心的转移，晚年前期的苏辙显然是成功地逐渐摆脱了颓然消极的心情，放下了精神上的悲苦束缚。从而，迈向悠然自适之心境。

第四章 晚年后期的苏辙

在苏辙晚年前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在不同阶段展现了不一样的主要心态。首先，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苏辙一开始在杜门不出的日子里的心情是颓然消极的。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持续颓废下去，反而是醉心于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并且达到了心境上的自我调适。田园人家的质朴，农事工作的繁多，渐渐消除了苏辙心中的郁闷。经过这样的生活形式上的转变，令苏辙得到了自我沉淀的机会。因此，他的作品和生活都趋向于平静自适。宋诗中不仅悲哀题材的作品少，即使表现悲哀，也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在理性的逻辑之中，依然透露出希望之光。（季羨林，2001：215）苏辙此时的诗作，恰好展现了这样的特色。通过苏辙晚年后期的作品，不但可看出他那份身处逆境中的从容自得，也可了解到他当时悠然自适的心情。

因此，在踏入晚年后期后，随着徽宗得八玺而大赦天下，苏辙在大观年间（1107-1110）恢复了官职，并且赐还了在贬谪之前的俸禄官爵。这样一来，也减轻了苏辙不少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在这样有所好转的生活环境中，比起晚年前期，苏辙的心态自然也有所转变。其中，两首晚年时期少见的政治诗，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再来，经过苏辙的作品分析后，会发觉他总是可以在波折中自适自得、保全其身，甚至是在晚年时期也不例外。所以，把政和年间的作品作为基本依据，可了解到人生中的最后日子里，苏辙反而展现出了他一贯的淡泊本性。对此，苏轼（1986：2296）曾言：“子由之达，该自幼而然。”，在哥哥眼中苏辙自小性情就比

较旷达。同期的张耒（1990：397）亦说过苏辙可以达到“是非袖手独超然”的境界。所以，有了这样与生俱来的旷达本性的苏辙，在晚年后期又会展现出怎么样的最终心态呢？在此，本章将分为两节，第一节将以苏辙在大观年间的两首政治诗，来探析其悠然之后的心态变化。而第二节则将以政和年间（1111-1112）的作品来解析出苏辙晚年时期的最后心境取向。

第一节 “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之坦然

在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相。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对于元祐党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因为，根据徐度在《却扫篇》中所提到：“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之说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叶左丞为祠部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圣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王云五主编，1935：190-191）的情形，可发现当时在叶梦得的进谏下，蔡京也认同了他的看法，因而对于元祐党禁有所松弛。作为当时仅剩不多的元祐党人之一，在这一年，苏辙终于可以减轻党禁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生命威胁了。对此，朱弁（2002：166）《曲洧旧闻》亦有提及：“京再做相，子由独免外徙。”所以，在苏辙晚年后期的开端，随着党争迫害强度的降低，他的生活环境可说是逐渐好转了。

自从入仕以来，苏辙的作品一直都是以散文为主。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对此，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贴切。（郭预衡，2000：523）此外，倪志间（2001，页318）在《中国散文演进史》中指出：“其所作叙事不及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一出之坦荡，抑扬爽朗而不为艰滞。”由此可见，在仕途中的苏辙一直对于政论都有独到见解，甚至对于权臣也敢于批评，正气凛然。但是，来到了晚年时期，可发现苏辙此时的作品多为诗歌，而风格也内敛含蓄，少了早期的虎虎生风的政治抱负。然而，在大观元年（1107），也许是党争的禁锢放松了，在心境上悠然自适的苏辙，此时却罕有地写下了直刺当时之政的政治诗。由此可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苏辙的心态也随之改变了。生活待遇的明朗化让此时的苏辙在心态上更加坦然自处了。

首先，苏辙藉由〈买炭〉诗，表达了忧患民生之情。然而，若更进一步地解读这首诗，可发现其中蕴含了政治隐喻，带出了对于当权者的批评：

“苦寒搜病骨，丝纻莫能御。析薪燎枯竹，勃郁烟充宇。西山古松栝，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龙伏熊虎踞。挑抉靡遗余，陶穴付一炬。积火变深鬻，牙角犹愤怒。老翁睡破毡，正昼出无屨。百钱不满篮，一坐幸至暮。御炉岁增贡，圆直中常度。闾阎不敢售，根节姑付汝。升平百年后，地力已难富。知夸不知嗇，俯首欲谁诉。百物今尽然，岂为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苏辙，栾城集，1987：1465）

在此，苏辙藉由朝廷与卖炭者之间的买卖来带出他对于朝廷奢侈之风的不满。首先，在诗的前半部，苏辙强调制作炭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不但获取材料的过程

艰难，制作过程中还得忍受高温的煎熬。只是，与其辛苦付出相比，这份工作所获得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老翁睡破毡，正昼出无屨。百钱不满篮，一坐幸至暮。”卖炭者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这些都是因为“御炉岁增贡，圆直中常度。闾阎不敢售，根节姑付汝。”当时的朝廷对于炭的需求量不止日益增加，还要求人民把所烧出的炭连根节都供上。对此，苏辙不免感慨当时执政者，只顾自己的利益，对于地方管治上，不但不事生产，还持续索取。这股不良风气已经蔓延到全国各个领域了，令他不得不为后世子孙感到担忧。在此，苏辙充分地表现出了在朝廷索取之风盛行的情形下，其对于人民的将来之深刻忧虑。近代学者孔凡礼在其论文中提到：“在苏辙同时代的作品中，没有一首诗像他这样深刻地讽喻朝政的。”（孔凡礼，2000：30）由此来看，苏辙对于当时社会动态是随时保持关注的。杜门自保的生活，自适其乐的精神追求皆不等于他将会对于政事漠然。反之，此时的苏辙心态坦然，乐于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现实寄托在作品当中。可见来到晚年后期，苏辙渐渐地不在拘泥于党争漩涡中，反而重拾自我，无所顾忌地面对生活。

另外，依据近代学者朱刚（2005，55）的研究成果，苏辙在颖昌时，其诗作的题目偏好清楚标示创作时间。其中，他晚年时期的诗题常常标明自己的生日，或者记录日期与各种节气。仅以《栾城后集》卷三为例，此卷存诗70首，而标明时间的就有将近20首，其他卷中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苏辙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对此，朱刚认为苏辙在此借用了春秋的笔法，《春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断礼义而见诸事实。进而推断出苏辙此时的作品的表层意义为忧农，其深层意义是喻政，特别是对于当时执政者的否定。这份对于民生生活的关怀，让苏辙突破了自己惯有

的内敛，于是就出现了直接批判当时朝政的作品。在大观二年（1108），苏辙（苏辙，1987：1471）也写了一首〈八玺〉诗来说明徽宗朝政治的不足。

那年正月，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苏辙也因此得以复官。而在〈八玺〉诗中所提及的八玺，就是这八宝。苏辙藉由八玺立论，来反映出当时徽宗政治的弊端。诗中写道：

“秦人一玺十五城，百二十城当八玺。元日临轩组绶新，君臣相顾无穷喜。九鼎崢嶸夏禹余，八玺错落古所无。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惯空惊呼。”

首二句是说明了八玺的贵重。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1959：2439）所载：“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秦王听说赵王得到了闻名天下的何氏璧后，表示要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然而，秦王的诡计被却被蔺相如识破了，最后这项交易也没有进行。在此，苏辙以和氏璧的贵重衬托出八玺的价值。据陆游（1997：211）所著的《家世旧闻》所载：“先君言：玉玺，旧有六而已，……至绍圣末，得秦玺，青玉也，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改元元符。崇宁中，又获一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亿，永无极”，莫知何代物。”在宋代自开国以来，原本只有六玺，然而在哲宗时期，得到了一枚秦代的玉玺，之后，徽宗之时，又再得一枚不知为何代的玺。这八枚玺原本“皆朴质，亦不甚大”，然而，蔡京为了迎合徽宗好奢华的习性，在得到徽宗的同意后，就另外寻找了八块质量高的美玉，把八玺的文字重新刻印上去。并且，在八玺制成之时，为了宣示皇权大事庆祝。由此可见，为了制作这八玺，多少财力都

投注在内了。所以，苏辙在此强调了八玺的贵重，是为了凸显出徽宗之政的铺张浪费。

之后，苏辙藉由夏禹时期的九鼎与徽宗这八玺的对比，将两者并列比美，说明给人的印象是昔日的夏禹就等同于今日的徽宗。之后，诗末两句“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惯空惊呼”先是将夏禹之后，徽宗之前的古人痛痛都归去鄙陋，而以徽宗直接继承夏禹，并且以此自豪。（孔凡礼，1999：28）最后一句则是描述了父老们对于这项荒谬言论的无所适从，纷纷惊呼不已。在此，苏辙借古讽今，以夏禹之伟大反衬出徽宗之不足。之后，更以父老的惊呼来带出百姓对于统治者罔顾民意，奢华浪费的不满。此外，亦可看出对于当时官员为了讨好徽宗，助长其骄奢作风的批评，尤其是蔡京。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京务兴事功，穷极奢侈，以蠹国之财赋。专事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徐梦莘，1987：372）由此可见，蔡京是一个奢侈谄媚的人。而且，在蔡京的私心下，自他拜相以来，就对元祐党人穷追猛打，禁锢不断。所以，对苏辙而言，对于此人祸国殃民之所为，自然会感到不满。对此，孔凡礼先生认为：“这首诗的主旨，归根究底，任然是讽刺”（孔凡礼，1999：28）这是一首政治诗，苏辙要讽刺不止是徽宗政治的腐败，还有蔡京这种只懂得阿谀奉承之辈。在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心态是坦然磊落的。他没有任何顾虑地将自己对于朝廷的不满和民生的忧患都写在诗中了。

所以，在大观年间，苏辙可说是几乎脱离了仕途不顺的颓然。并且，从悠然的生活里，加深自我生命的思考，再坦然地面对生活。而在苏辙（苏辙，1987：1471）同年的〈读旧诗〉中，也可发现坦然心态的痕迹：

“早岁吟哦已有诗，年来七十未全衰。开编一笑恍如梦，闭目徐思定是谁。敌手一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难期。老人不用多言语，一点空明万法师。”

此诗主要内容是关于苏辙在阅读了自己以前的诗作后所产生的感悟。在诗中，苏辙先回忆起自己的创作过程，说明自年少时期，就开始写诗了。然而，在“开编一笑恍如梦，闭目徐思定是谁”这两句诗则将苏辙在阅读了自己的旧诗后之感慨表露无疑。之前作品在此时苏辙的眼里，恍如梦般的虚无缥缈，甚至风格也呈现出令他不禁定神回想的陌生感。在此，苏辙感叹的不只是因为卜居已久而改变的诗风，更多的是对于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在苏辙写这首诗时，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均以去世，文坛暂时趋于沉寂，因此，他才发出“敌手一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难期”的感叹。（曾枣庄，1985：227）虽然，杜门不出的生活造就了失去交游对象，无法抒发自我情感的困境，但是，对此时的苏辙而言，“一点空明万法师”，藉由佛理自遣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由此可见，来到晚年后期，苏辙对于早期坎坷人生的释然，并且展现出了坦然的心境。

第二节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之淡然

来到晚年期间的最后阶段，在政和二年（1112），苏辙以中大夫转大中大夫致世，以疾告老于朝。虽然他在大观年间得以复官，但是却还是始终都闲居在颖昌。由此可见，他早已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了。据《宋史》所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顾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脱脱，1977：10835）然而，晚年时期的苏辙，不论是其人或是其文，与前期相比，对人对事都依旧保持淡然。虽然，本质上的差异不大，但是其人生哲学，精神面貌反而更加有所升华。也许正是因为这股汪洋淡泊的本性，苏辙在晚年时期才没有陷入颓然自废，反而在去世之前，恢复了其淡然的本性之外，精神面貌还进一步得到升华。

若要更了解苏辙的本性，需从其父兄方面着手。比如，父亲苏洵（苏洵，1993：414）就曾作有〈名二子说〉一诗来说明自己为儿子命名的原因：

“轮、辐、盖、軫，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在此诗，苏洵以两子的名字为铺叙，主要是要带出对他们做人处事方面的教诲。对于苏轼，苏洵希望他可以如车的轼般，虽然有关键的影响力，但千万不要锋芒太露。而对于苏辙，他深明自己儿子淡泊平静的个性，认为虽然人生没有什么大福，但

是，却能免于灾祸。因此，他也认为苏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皆安然无恙的。这样的说法恰巧和苏氏兄弟长大后的经历相符。苏轼在仕途上，由于锋芒太露，在党争时期不知道自保，最终落得颠沛坎坷。反之，苏辙在仕途上一直谨言慎行，表现不过不失，在晚年时期，面对黑暗的政治环境，懂得杜门自保，过着平静的归耕日子。由此可见，苏洵对于两个儿子的性格可说是了解地非常透彻，所以，二子后来的发展才会与其所预计的相似。

此外，在苏轼的眼中，他对于苏辙在逆境中的调适能力是大为赞赏的。在与友人的书信来往中，可看出他极为羡慕苏辙的“学道有成”。在与王定国书云：“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道气有成矣”（苏轼，1986：1531）而在与张耒的书信中亦有提及：“子由在筠，甚自适，养气存神，几于有成，吾济殆不如也。”（苏轼，1986：1538）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苏辙在筠州期间，虽然仕途上不遇，但是他可以平静地埋首学术研究，日子还过得颇为自适。这点，对于性情豪放的苏轼而言，是其难以达到的境界。所以，苏轼常常说苏辙的修养高于他，就是因为苏辙能够“独存”，而他自己则不耐“独存”的枯燥，不免于“寓”。在此，所指的“独存”就是真正高明的人，可以不假于外物，无所“寓”而保持其性灵的，达到可以不“寓”而自“存”的境界。（王水照、朱刚，2004：490）然而，从苏辙晚年时期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来看，他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确实能够保持心境平和，甚至自适自乐。由此可见，如苏轼所说的，苏辙的人格修养是相当高的。从父兄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苏辙在颖昌时期能够适其自然，闲适度日，与其天生的沉着本性是脱不了关系的。

之后，随着生活环境的逐渐好转，苏辙在晚年时期才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心，维持一贯质朴的性情，过着闲适淡然的日子。

苏辙晚年卜居颖昌十二载，期间与早期不同，当时所留下的作品多为诗歌。这段时期可说是苏辙诗歌作品的盛产期。虽然苏辙的诗歌风格淡然，情绪波动不明显，但是，因为这样朴实的本质，反而让人读后容易不禁陷入深思，引起深入琢磨的兴趣。比如说，在政和元年（1111）所作的〈秋稼〉诗末中云：“我愿人心似天意，爱惜老弱怜孤贫。古来尧舜知有否，诗书到此皆空文。”（苏辙，1987:1503）此诗的前半部是说明了虽然秋稼丰收，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穷边逃卒到处满，烧场入室才逡巡。县符星火杂鞭箠，解衣乞与犹怒嗔。”农家依然不得安宁。于是，苏辙在诗末前二句中坦露出自己期盼农民之苦能得到怜惜。这里所带出的如此真切之恳求，自然也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另外，诗末的最后两句也表现出苏辙由今疑及古，思想在日常现实生活有所突破。因此，可以说苏辙的诗作之境界是平淡有味，引人深思的。

所以，对于苏辙的诗歌，学者们也有相似的评价。比如：陈汗（曾枣庄、舒大刚，2001：546）在《宋十五家诗选·栾城诗选》中云：“栾城诗冲淡雅洁，如姑溪仙姿，有亭亭遗世之姿，非凡尘所能仿佛，与长公真堪仲伯”。而《载酒园诗话》亦云：“栾城身份气概总不如兄，然潇洒俊逸，于雄姿英发中，兼有醇醪饮人之致，虽亦远于唐音，实是宋诗之可喜者。”（郭绍虞，1983：389）毛瀚《论蜀诗绝句·苏子由》云：“颖滨平淡有天工，端和庐陵在下风”（曾枣庄、舒大刚，2001：

548)。丘晋成《论蜀诗绝句》云：“颖滨遗集署栾城，诗味都从静淡生”。（曾枣庄、舒大刚，2001：548）总的来说，姑且不将苏辙的诗作与其哥哥苏轼分出高低，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自己的风格的，就是平淡自然，用笔老到。藉此，亦可看出其平静闲适之心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其人或者其文，在晚年时期本质上还是一如既往地内敛恬然。但是，在这份淡然闲适的心境之下，丰富的人生阅历还是将他的精神面貌提升至更高的境界了。

回首在颖昌这段日子，对于党争所带来的政治迫害，苏辙从一开始的颓然消极，渐渐地转为淡然处之。其中，藉由生活重心的改变，他从颓然中振作，进而展现了悠然自得的心态。之后，随着苏辙复官，自然也标示着党祸迫害的远离。此时的苏辙的心态不但变得坦然，并且还拥有了恢复初心的勇气。最后，再加上个人汪洋淡泊的本性使然，他调适了自己的心境，并且迈向了更高的精神境界。举例来说，在政和元年（1111），七十三岁时，他作出了〈卜居赋（并引）〉（苏辙，1987：1523）。在引言中，他提及自己为何要卜居颖昌的原因，说明两代人卜居不果的情况。然而，对于自己的颠簸仕途，他记录道：

“予初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颖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一子居焉，曰：“姑糊口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

在这里，苏辙只用了短短两句就将自己大半生的仕途作出了总结。其中，对于早期如：元祐变法时期的政治情况是一概不载的。之后，在正文中花了大段篇幅来交代自己择居颖昌和思归眉山的复杂心情：

“吾将卜居，居于何所？西望吾乡，山谷重阻。兄弟沦丧，顾有诸子。吾将归居，归与谁处？寄籍颍川，筑室耕田。食粟饮水，若将终焉。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阅岁四十，松竹森然。诸子送我，历井扞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几百年，归扫故阡。”

只是，这个心中日思夜想的故乡却是“势不能返”的，因此，他只能寄望死后得以安葬于家乡。在此，可反映出苏辙当时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是对其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杜门自保的同时，苏辙就开始藉由佛老思想来追求心情上的旷达：

“我师孔公，师其致一。亦入瞿昙，老聃之室。此心皎然，与物皆寂。身则有尽，惟心不没。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从吾父，东从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处？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由此可见，在思想上，苏辙认为自己是孔子，即是儒家思想为主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有吸取佛老思想。所以，在三教的融合贯通之下，他达到了“此心皎然，与物皆寂。”的境界。因为，苏辙了解到做人不应再拘泥于外物的束缚、深陷于不遇之困惑中，反而要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由此可见，他在逆境中对于自身心境所进行的自我调适。最后，他以老子之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来结束全文。在此，表面上来看，苏辙是对于圣人不以有功自居，反而人们就归功于他的行为作出赞赏。然而，更深层的意思是，由于政治环境的黑暗，苏辙对于虚名追求之心也淡化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份释然。所以这也可以与在晚年时期政治仕途上不如意时，苏辙反而还是可以适其自然，自适自乐的情况相呼应。由此证明其在当时的精神境界已经升华至已经更加成熟的境界。

若要更深刻地了解苏辙晚年时期的最终心境，可以从其逝世之年，即是政和二年（1112）的作品中一探究竟。比如，在〈管幼安画赞〉里，苏辙（1987：1525）藉由管宁形象的刻画来带出对于自我生平遭遇的感慨。他在序言中记录道：

“幼安少而遭乱，渡海居辽东，三十七年而归。归于田庐，不应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没，功业不加于人。而予独何取焉？”管宁之所以得以自我保全，关键在于“其明于知时，而审于处己”。

与苏辙相比，两者同样在老年时期选择归耕田园。不同于管宁的自求归隐，苏辙却在历经了政治迫害、颠沛仕途之后，才不得不卜居自保，在归隐中寻求精神解脱。因此，这里所表现的不只是苏辙对于管宁的赞颂，更是对于自己深陷党争旋涡中的悔恨。

之后，他把管宁与四位古人，荀文若、张子布、华歆和许文休作出对比，说明“此四人者，皆一时贤人也。然直己者，终害其身；而枉己者，终丧其德。”，见识都不如管宁，从而再表示对于其“处乱而能全”的由衷赞美。由此可见，苏辙对于管宁得以身处乱世，却能全身而退的才智是非常推崇的。相对的，这也是代表了苏辙晚年时期所作出的自我反思。在此看出，他对于自己之前困于党争余祸的消极心态，感到非常懊恼。所以，此时的苏辙作出了这样的反思，也证明其精神上已经成功摆脱了仕途不遇所造就的郁闷，在精神境界上获得超脱。这篇可说是苏辙晚年时期精神升华的代表作。

总的来说，苏辙性情沉静内敛，不事张扬，则其诗文之朴质风格正是其人格的体现。（吴增辉，2011：217）然而，从晚年后期苏辙的作品来看，发现苏辙不论是其人或者其文，其实都未有脱离初衷，本质上还是一贯地汪洋淡泊。首先，在大观年间，苏辙少有地写了两首政治诗。在此，可看出他无所顾忌的坦然。之后，因为经过了大半生的坎坷仕途，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也可发现其成功调适颓然心情，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的痕迹。而这样心态上的自我调适，也令其得以归于淡然。所以，从他在回顾中，对于自己仕途描写的淡化处理，再到对于自身前期深受党争影响的悔恨与反思，可总结出苏辙晚年时期的最终心态不只是恢复了淡然本性，甚至还已经超然于党争之外，达到自适自乐的境界。

结语

通过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个人命运、学者评价以及特定作品为基本参照，可还原出苏辙在晚年时期心态的变化历程。首先，苏辙的一生与党争紧紧相系，因此，他大部分的文学创作都与政治背景脱不了关系。在这样的生平背景影响之下，可以将苏辙的生平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以嘉佑时期初入仕的未受重用为始，再发展到了熙丰时期，苏辙当时已经是作为反对变法旗帜人物的存在。然而，他也因此遭受到了“乌台诗案”的打击。之后，随着高太后的参政，苏辙在元祐年间迎来了一展抱负的政治高峰期。而他在这段时间对于新党成员的排挤，自然为自己树敌不少。所以，在绍圣时期，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后，苏辙也俨然成为了党祸的首要目标之一。最后，经过了大半辈子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苏辙在晚年时期，也是自己政治际遇最恶劣之时，为了保全自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二年的闭门生活。

在杜居生活的初期，苏辙这项谢绝交游、畏人畏事的举动并没有成功让自己逃离党争的迫害。在崇宁年间，从元祐党人碑的设立再到元祐学术的禁毁，可看出新党对于旧党人员的排挤是持续升级的。因此，在遭受了连番打击之后，此时的苏辙在孤苦生活中，展现了少见的消极颓然心态。然而，这样的悲观心情其实没有占据苏辙晚年的全部时间。在生活重心的转换之下，苏辙投身田园，修养身性。并且，从中发现他经过这样的心态调适后，其晚年前期的作品也慢慢地呈现出一番平静的韵味。由此可见，苏辙在晚年早期闲居生活里的心态已从一开始的颓然痛苦，转化为以自适自得悠然心态为主了。

最后，来到晚年后期，随着徽宗的大赦天下，苏辙不但恢复了官职，也得回了俸禄。所以，他的生活环境自然也有所改善。再加上新党对于旧党迫害行为的缓和，苏辙此时终于可以暂时摆脱生活压力。生活待遇上的好转，也让苏辙的心境逐渐趋向明朗，并且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在大观年间，苏辙写下了少见的政治诗。在诗中，他不但大胆地直刺徽宗政治之不足，也批判了蔡京等臣子阿谀奉承的行为。此时的苏辙心态可说是一扫了前期的党祸阴霾，展现出无所顾忌的坦然。这样的正面心态，也让苏辙开始从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最后，在他对于自我人生的总结中，可发现苏辙在人生最后的时期，心态上可说是回归本质，恢复自己最初的一贯淡然了。总的来说，在十二年里，苏辙通过自我心态调适，从前期的颓然消极，最后返朴归真，成功转化为汪洋淡泊之心境，因此，晚年时期也可说是苏辙思想最深邃的时期。

参考书目

一、引用古籍

- 1、陈邦瞻(1977)，《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 2、葛立方著(1981)，《历代诗话·韵阳秋语》，北京：中华书局。
- 3、郭绍虞编选(1983)，《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顾吉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5、李焘撰(200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 6、刘熙载(1978)，《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7、陆游(1997)，《家世旧闻》，北京：中华书局。
- 8、司马迁(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 9、苏轼著(1986)，《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10、苏洵著(1993)，《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1、苏辙(1987)，《栞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2、苏辙著、(1990)，《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 13、脱脱(197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 14、徐梦莘(1987)，《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5、王明清(2001)，《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6、张耒(1990)，《张耒集》北京：中华书局。
- 17、朱弁(2002)，《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

二、引用专书

- 1、曹础基(2000)，《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
- 2、迟文浚、宋绪连等（1999），《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3、郭预衡(2000)，《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吉川幸次郎著（1977），《宋诗概说》（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5、季羨林主编(2001)，《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
- 6、孔凡礼(2001)，《苏辙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
- 7、林瑞翰(1989)，《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
- 8、吕慧娟、刘波、卢达(1997)，《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9、倪自间(2001)，《中国散文演进史》，台北：台湾长白出版社。
- 10、沈松勤(1998)，《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 11、孙望、常国武(1996)，《宋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2、涂美云(2012)，《北宋党争与文祸、学禁之关系研究》，台北：万卷楼。
- 13、王水照(1997)，《宋代文学通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 14、王水照、朱刚(2004)，《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5、王云五主编(1935)，《丛书集成初编·退斋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 16、萧庆伟(2001)，《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 17、杨庆存(2011)，《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8、曾枣庄、舒大刚(1999)，《北宋文学家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
- 19、曾枣庄、舒大刚(2004)，《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20、曾枣庄、舒大刚(2001)，《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
- 21、曾枣庄(1985)，《三苏文艺思想》，四川：四川文艺出版。
- 22、曾枣庄、吴洪泽(2010)，《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
- 23、周裕锴(2007)，《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1996），《中国文学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5、张毅（1995），《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

三、期刊论文

- 1、孔凡礼（1999），〈苏辙的一首政治诗-《八玺》〉，《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26-28。
- 2、孔凡礼（2000），〈忧深思广-读苏辙《买炭》〉，《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页28-30。
- 3、李冬梅（2002），〈苏辙研究综述〉，《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页111-114。
- 4、李佩如（2005），《北宋党争对苏辙创作的影响》，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国立政治大学，台北。
- 5、吴增辉（2011），《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上海。
- 6、朱刚（2005），〈论苏辙晚年诗〉，《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页51-63。